

浅析大月氏人的迁移

张晨霞

(青阳县第三中学, 安徽 青阳 242800)

[摘要] 大月氏人是一支先秦时期居住在我国北部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公元前 208 年之后, 在匈奴人策划的几次打击之下, 他们不断向西迁徙, 最终迁徙至中亚河中地区。大月氏人的迁徙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大月氏; 匈奴; 迁徙

[中图分类号] K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771Q (2007) 02- 0065- 03

《中国历史》课本第一册在记载张骞通西域时, 曾经简单地提到了汉武帝欲联系大月氏人共同夹击匈奴的史实。由于篇幅所限, 课本中对于有关大月氏人的记载较为含糊。为了使得大家对于月氏人及其迁徙有一个完整的了解, 本人对此进行了梳理。浅陋之处, 请各位学者见谅。

一、月氏人及其始居地

很早以前我国古代典籍就提到了月氏人。但是, 各种文献对月氏的称呼却不相同。《逸周书·王会解》中称其为“禺氏”(ngjo-tjie), 《穆天子传》中称其为“禺知”(ngjo-tie) 或“禺氏”, 《山海经·海内东经》称其为“月支”。这些名称显然是对“月氏”一名的各种译称, 实际上指的都是同一个种人。一般认为月氏人属于印欧种人, 其故乡是在黑海与里海之间的北部草原上。大约从公元前四千纪起, 印欧种人从开始这里出发, 不断地向南、向西和向东迁徙。至于月氏人是什么时候来到我国古代西域地区的, 以及他们是从哪一条路线进入该地区的, 只有根据印欧种人大迁徙的时间和路线进行推测, 本文不予讨论。

月氏人属于游牧部族, 随水草而迁徙。其风俗习惯与亚欧草原上的其他游牧部族相同。对此我国史书也作了记载。《史记·大宛列传》中说: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 国虽颇异言, 然大同俗, 相知言, 其人皆深眼, 多须髯。”所谓大宛之西, 自然也包括大月氏在内。

关于月氏人在我国古代的居住地, 我国史书也有记载。据《穆天子传》卷一云: “甲午, 天子西征, 乃绝踰之关隘。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后人注: “踰, 阪也; 疑此谓

北陵西踰。西踰, 雁门山也。”这可能是有关月氏的最早记载, 它表明月氏可能生活今河套以北地区。《管子·轻重乙》称: “玉出于禺氏之旁山。……玉起于禺氏之边山, 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管子·轻重甲》则称: “辟千金者, 白璧也, 然后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然后八千里之崑崙之虚可得而朝也。”有学者推测, 此处崑崙应该是指阿尔泰山。当时的月氏人可能向西将其势力延伸到阿尔泰山东麓。《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说: “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按照这种说法, 月氏的原居地应该在敦煌和祁连山之间。

综合以上几种记载, 可以推测月氏人的原居地可能是在敦煌和祁连山之间的河西走廊上, 在西部, 其势力影响到阿尔泰山地区, 在东部其势力影响到河套地区。有学者甚至指出, 月氏的原居地应该位于河西走廊的东部。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也是成立的。

二、月氏人迁徙的原因及过程

那么, 始居于河西走廊一带的月氏人因何向西迁徙? 史学界一般认为, 匈奴的崛起是月氏人迁徙的主要原因。

根据《史记》记载, 在公元前三世纪, 蒙古草原上的种族分布状况大致是: 河套地区以西地区分布着月氏人, 河套地区以东至辽河上游分布着匈奴人, 辽河上游居住着东胡人。而当时的情况是“东胡强而月氏盛”, 处于中间的匈奴还未强大起来。在这种情况下, 月氏和东胡不断地从东、西两个方向挤压匈奴。这种局面甚至一直持续到公元前三世纪末的头曼单于时期。当时匈奴单于为了换取安宁, 不

得不送太子冒顿到月氏人处为人质。

到了秦朝末年的时候,匈奴人开始强盛起来。匈奴兴起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匈奴原始氏族公社的瓦解,同时也促进了匈奴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公元前三世纪,铁器开始在匈奴广泛使用,这大大地推动了匈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匈奴原先的氏族公社内部也开始出现了私有制,并从根本上动摇了氏族公社存在的社会基础,氏族公社逐渐走向瓦解。匈奴的社会经济形式也从以前的集体放牧转变为私人放牧。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极大地推动了匈奴经济的发展。第二,中原先进农耕文化的影响。长期以来,匈奴就与中原地区进行广泛的商贸往来。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人为了获得“絮、缯、酒、米、食物”,匈奴和与黄河流域的汉族农业地区经常往来。中原地区为了获得马匹以备耕战之用,也希望以物品与匈奴交换马匹等。同时,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文化也深深地吸引了匈奴人。而当时中原地区动荡的社会生活迫使许多汉人为了躲避战乱和压迫经常逃入匈奴地区。一些汉族的知识分子也因政治上的失意转而依附于匈奴,甚至积极为匈奴首领出谋划策。此外,通过战争匈奴又从中原地区掠获了大量的人口,其中包括许多工匠、艺人和农民等。这些归附和被掠夺过来的汉人为匈奴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文化,为匈奴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匈奴诸部落的联合。在冒顿单于之前,匈奴各部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冒顿单于即位以后,他随即着手把匈奴各部逐渐地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这大大增强了匈奴自身的力量,并最终促进了匈奴人的崛起。

强盛起来的匈奴人随即着手发起了对于月氏和东胡的反击。为了与月氏和东胡抗衡,匈奴冒顿单于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措施来对付东胡和月氏。在大破东胡之后,冒顿单于于公元前201年向月氏发动了进攻。此役,虽然匈奴没有彻底打败月氏,但却有力地遏制了月氏东进的势头。此后,匈奴为了剪除月氏的威胁,雄霸北方草原,又不断发起了对月氏的进攻。在匈奴的打击之下,月氏人被迫不断迁徙。匈奴对月氏的打击可分为三个阶段,月氏人的迁徙也依次展开。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阶段的打击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77年或公元前176年。这一时期正值匈奴冒顿单于统治时期。匈奴对月氏的大规模战争不仅彻底地打败了月氏,并且他们还也借机征服了月氏在西域的属国。被匈奴所破的月氏人,在居地和属国皆被占领的情况下,只得离开所居住的河西走廊一带向西迁徙。在西迁的途中,月氏人冲击了生活在月氏人西部地区的乌孙部,杀死了当时乌孙昆莫(意思是“王”)难兜靡。乌孙余众则携刚出生的难兜靡之子猎骄靡投奔匈奴。这一事件又为以后乌孙人讨伐西迁的月氏人埋下了伏笔。

月氏人的第一次西迁可能是沿着天山北麓进行的,最后抵达了中亚伊犁河和楚河流域,即史书上所记载的“塞

地”。迁徙而来的月氏人又迫使原来居住在伊犁河和楚河流域的塞人向南迁徙而去。对此《汉书·张骞传》记载说:“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至此,月氏人开始分裂为两支。其中,西迁的月氏人被称为大月氏,而少数残留在“敦煌南山”与羌族人混居在一起的月氏人以后被称为小月氏。

第二阶段的打击大致发生在匈奴老上单于在位时期(公元前174~161年)。在匈奴的打击之下,大月氏惨败,其王也被匈奴人所攻杀。《史记·大宛列传》对此记载说:“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器。”匈奴对月氏的第二阶段打击虽然使其遭受重创,但并没有引起大月氏人的迁徙,当时他们仍然坚守在伊犁河和楚河流域。

匈奴对月氏的第三阶段的进攻发生在公元前130年前后。此役是由匈奴军臣单于(公元前161~126年)指使乌孙难兜靡昆莫之子猎骄靡昆莫发起的。远征大月氏的乌孙人大获全胜,他们占领了伊犁河和楚河流域。战败的大月氏人此时不得不再次迁徙。迁徙的路线是:从伊犁河和楚河流域南下,经大宛(即费尔干纳),然后向西迁入中亚河中地区。对此《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说“(大月氏)及为匈奴人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这里的“妫水”是指中亚地区的阿姆河。

至此,大月氏人完成了他们的向西迁徙活动,并最终淡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迁徙中亚河中地区的大月氏人也揭开了中亚历史新的一页。

三、大月氏人迁徙的影响

大月氏人的西迁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大月氏人的西迁使得匈奴人解除了大月氏人对其构成的威胁,使其能够独霸于北方草原。从此,匈奴人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的与中原地区的汉王朝政权进行对抗。

其次,迫走大月氏人之后,匈奴人取而代之垄断了这一时期的中西贸易,成为中西交流的主要媒介。从属于这一时期的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区,以及中亚其他地区的考古发现来看,当时中亚一些地区和南西伯利亚等地所受到的中国文化的影响,显然是通过匈奴来实现的。而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汉武帝时期,这无疑对中西交流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再则,迁徙至中亚河中地区的大月氏人对也中亚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大月氏人迁徙至河中地区之后,灭掉了当时中亚地区的大夏政权,设置五翕侯进行统治。对此《汉书·西域传》记载道:“大夏本无大君长,城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故月氏徙来,皆臣畜之,共禀汉使者。有五翕侯:一曰休密翕侯……二曰双靡翕侯……三曰贵霜翕侯……四曰胘顿翕侯……五曰高附翕侯……凡五翕侯,皆属大月氏。”而后来对中亚乃至世界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贵霜王朝正是大月氏所设置的五翕侯之一的贵霜翕侯。由此可知,大月氏人的迁徙对中亚和世界历史影响的深远。

(下转第70页)

个历史悠久、有 13 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即使文化市场被西方文化产品占领 30% 的市场份额,都将危及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提高我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意义还在于,随着我国加入 WTO 和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我国文化产业有“走出去”的现实要求,一方面可以改善我国外贸结构,扭转我国文化贸易的巨额逆差,另一方面可以宣传中国文化,扩大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而目前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额还很小,在国际文化市场上所占份额还微不足道,文化贸易逆差巨大。要想扭转贸易逆差,使我国的文化产品在世界文化市场占据与国力相称的市场份额,就必须提高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合理的文化产业政策对于提升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国家文化产业的保护措施,为本国的文化产业成长赢得了时间,争取了空间。其次,国家在财税、税收、出口补贴等方面的扶持,有利于缓解本国文化产业的资金瓶颈,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使本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具有价格竞争优势;采取更加积极的产业组织政策,培育若干具有国际水平的文化跨国公司,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提高产业组织化程度,提高文化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实力;政府还可以通过为企业提供各种服务,如完善文

化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增加政府的研发投入,通过大学加快培养文化产业急需的人才,建立信息服务系统,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为文化企业“走出去”创造有利的条件。这些政策与措施的实施必将有利于提升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 [1] 郭义钧,邱钧.产业经济学[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501.
- [2] 秦嗣毅.日本宏观调控中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反思[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1):86-91.
- [3] 贾新光.汽车产业政策怎么改[N].经济参考报,2003-5-20(7).
- [4] 郭义钧,邱钧.产业经济学[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518.
- [5] 刘宁宁.日本产业政策及其在日本现代化中的作用[J].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3).
- [6] 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文化产业统计数据[EB/OL]. [2006-5-19].<http://www.jfdaily.com>.

(责任编辑:韩志才)

(上接第 66 页) 注释:

关于月氏人种的问题,史学界存在争论。这里采用印欧种人的说法。详见[匈牙利]雅诺什·哈尔马塔主编《中亚文明史》,第 2 卷,徐文堪、芮传明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年出版,第 127 页;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出版社,1994 年出版,第 110 页。

参见马雍、王炳华著《公元前七至二世纪的中国新疆地区》。转引《中亚学刊》第 3 辑,中华书局,1990 年出版,第 1~16 页。

参见王明哲、王炳华著《乌孙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年出版,第 4 页。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的冒顿单于给汉室的一封信上叙述了这件事情,其云:“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上文“小吏之败约”是指汉文帝三年,即公元前 177 年,匈奴右贤王进入黄河以南地区,侵犯上郡,进行杀略一事。据此可知,所叙述之事应该发生在公元前 177 年或公元前 176 年。参见余太山著《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出版,第 56 页。

关于月氏西迁的年代和路线,史学界争议颇多。其年代历来有两种说法,一说迁于匈奴冒顿单于时,一说迁于匈奴老上单于时。前者又可再分为两种即公元前三世纪和公元前 177 年或公元前 176 年。这里采用公元前 177~176 年左右这种观点。关于月氏西迁的路线,一说是沿天山南麓

西迁;一说是沿天山北麓西迁。这里采用后一种说法。见余太山《大夏大月氏综考》,转引中华书局出版的《中亚学刊》1990 年第 3 期和苏北海著《大月氏的西迁及其活动》,引自《新疆大学学报》1989 年第 2 期,第 31~37 页。

关于大月氏为乌孙所迫西迁阿姆河的时间,也有两种说法。一说始于老上单于时期,即公元前 174~161 年;一说始于军臣单于时期,即公元前 161~126 年。据西方史料记载,大约公元前 129 年,帕提亚国王弗拉特二世(Phraates II,公元前 139~128 年)西征塞琉古王朝的叙利亚王国;但因盘踞在索格底亚那和巴克特里亚等地阿色尼人和吐火罗人等塞克人从东北部大举入侵,而不得不转而同塞克人作战。因而可推知大月氏人南下的时间可能是公元前 130 年。这里采用后一种说法。参见余太山著《塞种史研究》,第 58 页。

笔者认为这里张骞所叙述的应该是月氏第二次迁移的情况,而不是月氏首次西迁的情景。司马迁的这一记载虽然道出了事情的本质,但终究有些笼统。也正是这一笼统的说法导致了后人对这一史实的含糊理解,即:大月氏为匈奴所破,随即西迁并臣服了大夏政权等误解。但这一叙述基本上道出了事情的实质,原因有二。其一,大月氏放弃伊犁河和楚河流域,其直接原因是乌孙昆莫所击败,其根本原因却是此前老上单于所重创之故。其二,昆莫攻击大月氏,尽管是乌孙击败了月氏,但毕竟是在匈奴的指使下进行的。

参见王治来著《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年出版,第 86~87 页。

(责任编辑:胡惠芳)